

汙名與歧視：不要叫我「外籍新娘」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 蔡明原

* 前言

臺灣社會中「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傳宗接代」的傳統觀念深深影響著一般大眾對於「婚姻」這件事情的態度，單身或者不婚可能是一種會被投以異樣眼光（甚至歧視）的人生狀態。因此對於在臺灣尋找情感對象受挫（身體缺陷、經濟能力不佳等原因）的男性來說，結婚以及生養下一代這種終生大事（難以迴避）就成為一種必須依靠金錢買賣才能夠完成的「任務」，而他們的對象便是東南亞地區（越南、柬埔寨、印尼等國家）「未受過高等教育，來自貧困家庭」的女性、也就是一般社會大眾口中熟稱的「外籍新娘」。在社會學的研究當中，夏曉鵬認為這種形式的婚姻必須放置在「全球女性貿易」這個大的範疇中去討論才能理解這不會只是純粹的「買賣婚姻」行為，卻是涉及到國與國之間（「經貿關係」）這樣層面的議題。此外，透過性別、空間（家庭）、傳媒、國家政策等各種不同的切入角度更能幫助我們清楚的認識到「外籍新娘」在臺灣是如何被汙名化以及她們生活中所面對的種種艱難處境。這種困境並不會因為「外籍新娘」有了下一代之後開始改變，反而衍生出「新臺灣之子」在身分認同上產生疑惑、和同儕相處多有紛爭等問題。

當這些問題從零星個案逐漸成為普遍現象的同時也受到了作家的關注，從 2008 年到 2011 年三年的時間就有五本相關題材的少兒小說出版，依照出版先後順序分別是李光福的《我也是臺灣人》，張友漁的《西貢小子》，李光福的《哎呀！我的媽》，羅明道的《別叫我外籍新娘的小孩》，蔡佐渝的《我的越南媽媽》。這些作品的訴求基本上相當一致，都希望能夠為「外籍新娘」、「新臺灣之子」撥除強烈針對性的刻板印象。這樣的共識雖然不令人意外但其實頗令人好奇它們是各自在怎樣的情節演繹後匯流而成的，例如作品所各自關注的事件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進一步思考，這幾部相同題材的少兒小說的敘事策略又有哪些異同之處？

* 缺席／失能的男性

可以發現小說中東南亞的女性面對前來找尋結婚對象的臺灣男性多數是身有部分缺陷或是性格軟弱，甚至要到婚後才發現看似富裕的男方家庭原來只是為了便於求得對象而製造出來的假象。在許多不得已的情況下「外籍新娘」們往往得擔負不同程度的家庭責任，並且還得承受來自親族、鄰坊的壓力與耳語。《西貢小子》裡的男主角是位必須依靠拐杖才能行走、個性沉默寡言的身障人士，總是以冷淡的態度來面對家中的紛擾（婆婆惡言、誣賴媳婦）。《哎呀！我的媽》中有著酗酒、家暴傾向（不事生產）離婚後仍不時會回來糾纏不清的父親自始至終都無法成為家庭支柱，反倒是親人恐懼的來源。《我的越南媽媽》裡的「外籍新娘」除了要照料

病癱在床的丈夫外，更要協助刻薄的婆婆做生意維持家計。這幾位「外籍新娘」在這種家庭環境中的相處方式多是以忍耐、忍讓為主，但事實上語言隔閡、文化差異和經濟弱勢等因素是她們不得不先安於現狀的主要原因。因為如果真的要從原生家庭出走、獨立，首先要臨的就是應付生活種種必需的挑戰；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知道幾位「外籍新娘」必須要跨越許多關卡才能實現自給自足的理想。

而在《別叫我外籍新娘的小孩》這部小說中的男主角雖然身體健全，不過對自己媽媽不斷地以惡毒、尖酸的言語責備妻子時竟沒有介入的餘地。透過小說的描述我們看到了男性的缺席／失能是這種類型的跨國婚姻之所以波折不斷的原因之一，在這樣的前提（生養後代且不具情感基礎）下的結合所遭遇的尷尬處境；彷彿是一種無法解脫、互為因果的輪迴。而在《我也是臺灣人》這部作品中的男性主角及其家庭關係相較於其他作品可以算是完美且和諧，我認為原因在於兩人共同經歷了「追求」的過程進而讓雙方對於彼此（以及女方雙親）有著一定程度的認識（語言相通）。其中更為關鍵的地方在於彩枝擁有的自主權力，她可以依照自己的喜惡、判斷做出不違心的決定：「臺灣是一個既遙遠又陌生地方，要她嫁到臺灣，她實在一點意願也沒有，當場便拒絕了。」雖然最後彩枝還是來到了臺灣，但卻不曾後悔自己做的這個決定更時常會回憶起了過往的甜蜜情景。

* 看見臺灣：讀冊識字

臺灣民眾普遍存在一種優越、自認高出「外籍新娘」一等的心態，認為她們不夠聰明但卻又千方百計阻止她們識字、讀書。《西貢小子》裡婆婆反對家中的越南「媳婦」上學的理由是：「一旦她的心像野馬一樣野了，你就追不到她了。」而在《別叫我外籍新娘的小孩》中也是同樣的顧慮：「我婆婆其實不太喜歡我出門，她怕我出去學壞」。這種心情其實相當矛盾，一方面貶抑一方面又擔心她們在取得和這個國家溝通的主要工具（文字）後反而會不安於室。把所有的「外籍新娘」去脈絡後以偏概全套上來自鄰坊的以訛傳訛與傳媒的刻板化報導所塑造出的負面形象，這樣的對於人性的不信任實際上是一種合理化自身行為（惡意）以及刻意忽略人本殊異的事實。

所以作品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展現出了識字這件事情的重要性，目的就是為了導正「外籍新娘」會因此而學壞、離家甚至走入歧途的誤解。《我也是臺灣人》裡的彩枝因此不會再被小孩騙錢，《西貢小子》裡的阮氏好終於看得懂女兒寫的家書更能親筆回信，《我的越南媽媽》中的阮貞和《別叫我外籍新娘的小孩》裡的小惠都在識字班認識了許多同鄉好友、拓展了自己的生活圈。識字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於它決定了人們是否能參與（被納入）國家體制的運作，比如說有能力參閱關乎自身權益的明文法規、簽署各式各樣的書面文件和安排（滿足）生活中的各種需求等，也唯有如此「外籍新娘」才能在家中男性缺席／失能的情況下擔負起養家的重擔。

*「新臺灣之子」的疑惑：我是誰？

這幾本小說的人物角色中都有所謂的「新臺灣之子」的出現，他們在生活中所面對的問題基本上不會比「外籍新娘」要來的少、甚至更為複雜。因為母親國籍的緣故，這些「新臺灣之子」首要難題就是來自於同儕間的訕笑與羞辱；這些「惡劣」的言語在發酵過後成為了他們性格上反叛、多疑以及憤世忌俗的主要原因。比如《西貢小子》裡的少寬和同學間一直出現的衝突場面，《別叫我外籍新娘的小孩》中輕視自己的母親、被學校老師視為問題人物的武雄，《我的越南媽媽》中的在外人面前說自己的母親是家庭傭人的呈泰，被視為異類的他們還未有足夠的能力去反駁或者反思這些話語生成的真正原因而用激烈、脫軌的行為作為接收這些其實不難理解，但令人好奇的是這些「新臺灣之子」是如何轉化自己的心境的？意思是說，他們在應付頻繁出現在日常生活中惡意對待的同時所出現的使大人們頭痛的反應是怎樣被這些「論述」所說服的？但必須先體認要打破這種幾乎是普遍性的有關「外籍新娘」的刻板印象，所需要的解構動能與論述空間恐怕不是一本或者數本小說可以承載的，也許是要透過世代的努力才有達致的可能。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最後都指向了想要知道自己到底是誰的渴求，他們所面對的正是非我族類、排除異己這一種心態的展示。例如《西貢小子》裡的少寬被說成是「越南來的小外勞」、「西貢小子」，而他則是以賭氣的姿態面對他人的疑問：當臺灣人問起、他會說自己是越南人，反之亦然。少寬看到眾人對他們投以不友善的語言之後刻意說出讓大人感到不愉快的答案的原因在於沒有人真正關心或了解其心情；這位小學生一方面不知道繼續待在這個地方的理由是什麼，一方面是想不透為何自己身分竟是如此卑微。最後解開這種矛盾心理的卻是沉默寡言的父親，他說：「你是臺灣人也是越南人，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如果臺灣人的血是藍色，越南人的血是黃色的，那麼你去作血液分析，就會發現你的血液是綠色的。」這段作為兒童能夠理解的程度的話相當精準地切中了少寬所疑惑的核心，他的身分應該是以包容而不是排除的方式來進行定義。這也化解那些歧視話語所帶來的傷害，母親不管是從哪個國家來都不應該是她與少寬所要背負的原罪。

《別叫我外籍新娘的小孩》中武雄的小學教師（馬來西亞籍）向大家解釋不同的文化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一個國家（人民）的優劣不能以其強盛與否作為唯一的判斷標準，「孩子們有機會跟各個不同成長背景的人一起學習，對他們絕對是個好處……這個世界是因為不同而美麗」。這位教師認為生活中種種有著「差異」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也應該對各個國家抱持著一視同仁的看法，不能因人廢言（崇洋媚外）。

《我的越南媽媽》裡當「越南雜種」、「越南豬」如此惡劣的字眼出現的同時，呈泰直覺自己的世界將會有著巨大變化。同學們在知道這件事情後開始排斥他，「薛呈泰卻敏銳的查覺到她們的眼睛正不斷向他瞄來，隨即在目光尚未與他交會之前又警戒的收回，繼續講著悄悄話。」小說中扮演說理、試圖紓解這樣的對立局面的角色的身分別是臺灣籍的老師和另外一位

「新臺灣之子」張繼明，兩個人分別以「沙拉」和「墨鏡」為譬喻來消解這種在同儕間不斷孳生的偏見。少寬的老師認為如果「沙拉」的特別之處在於它的內容的多樣性，她說：「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同的，但我們能聚在一起，就表示我們是一碗裹著同一種沙拉醬的沙拉。」張繼明以為那些隨口罵出「越南豬」的人就像是戴著各種顏色的墨鏡在看世界卻不明白眼中的一切早就因此而失真，「沒有用真正的眼鏡去看世界，那是他們的損失」。

《西貢小子》中王新來的說法意味著少寬、少南身上流著的是一種嶄新的、混雜過的「血液」，它不會保有自身（台灣／越南）特色、或者還可以從中把誰分離出來；它兼融了兩者而且不能被單獨定義。以血緣論作為「新臺灣之子」們疑惑的解釋所強調的是「血濃於水」、「血脈相承」的概念，所以當少寬的父親說的「你只要記住，你是我王新來的家人就行了」這段話就像是為身分、國籍的紛爭一錘定音。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混血」說法也試圖打破人們的「血統」純正迷思、剔除附著在「雜種」這個詞彙上的負面想像。《我的越南媽媽》裡老師以「沙拉」為喻在乎的是人的獨特性，應該視眾人之間的差異（身分）為正常的現象。換句話說，不管你是哪裡來在這個國家（沙拉）當中就是重要的一份子，國家也會因你而豐富增色。王新來和李永惠的說法背後指涉的是「血緣」與「國族」這兩個大敘述，前者認為像少寬、少南身分認定的意義是多重的；後者以為國家的價值與可貴之處（只有一種蔬材的沙拉不叫沙拉）在於人們皆認同差異的存在是不能抹滅的事實。

*「說話」的方式

《別叫我外籍新娘的小孩》、《我也是臺灣人》、《我的越南媽媽》是以第三人稱作為敘述角度，《哎呀！我的媽》則是第一人稱、由美華（「外籍新娘」的女兒）擔綱主要敘述者。《西貢小子》這部作品最為特殊，它是讓阮氏好與少寬分別在各個篇章之間（情節不一定連貫）承擔主要敘述者（第一人稱）的任務。這種處理方式相當有趣，這意味著兩種不同的認知和觀點在同一部小說中展演，我認為其用意與顧慮在於如何「再現」（representation）真實人生之間取得平衡或者是找到最適合的表達方式。透過這幾本書的序言可以清楚知道作家們的寫作意圖與動念，《我也是臺灣人》、《哎呀！我的媽》的作者李光福說：「你的身邊有著生活美滿的外配媽媽，別忘了為她們喝采，因為她們一定克服了許多困難，才能嘗到幸福的滋味。」蔡佐渝（《我的越南媽媽》）希望大家可以「抱持著平等、開放的心胸，讓這些外來的族群自在舒展，進而彼此接受、相互融合」。羅明道的序言（《別叫我外籍新娘的小孩》）是這樣說的：「原來社會上稱呼他們為『外籍新娘』的原因，是大家心裡都覺她們撈了錢就要走，並不想好好的住在臺灣。」

而觸發張友漁寫作的原因是在生活中、在新聞裡接觸許多跟「新移民」有關的事物，而這些事物大多並不美好。幾部作品的創作意圖都是奠基在要說出「外籍新娘」們的故事、為她們發聲正名這樣的想法之上，主要目的就是要化解所有加諸在「外籍新娘」（包括這個充滿歧視的詞彙）身上種種莫名的指摘。也就是說，小說「再現」了「外籍新娘」在臺灣社會中面臨的

種種艱難處境的這個「現實」，但「外籍新娘」的真實人生卻是連和外界溝通、對話（語言學習）都要耗費心神。所以小說家揣摩以及呈現「外籍新娘」的心理狀態、想法與思考是兩件性質不同的事情，前者可以憑藉各種資料訊息以及自我的生命經驗開啟想像，後者的問題是「外籍新娘」在作品中要如何「說話」的效果才會最大。

張友漁在〈當地球人遇到地球人〉（後記）裡提到為了寫這本書出版社安排她到越南「進行文化觀察」，易地而處的過程中似乎更能體會「外籍新娘」們的心境，她形容自己和當地人比手畫腳溝通事情費盡心力後還是無法讓對方了解的時候就像是卡夫卡的小說《變蟲記》裡那位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竟然變成了一隻完全無法和外界溝通的昆蟲：「我可以縮短了行程，放棄溝通，用我破爛的英文訂火車票回北越，再回臺灣。但是，嫁來臺灣的外籍配偶卻不行，她們得繼續忍受生活給她的磨難……我真的很高興這趟旅行有這樣一段插曲，我才能深刻感受到，當想法無法正確地傳達而招致誤會時，那種無助與氣餒。」這個比喻十分鮮活地傳達出「外籍新娘」在臺灣啞口的無奈，因此阮氏好的篇章的內容大多是她對於生活的感受和觀察，對話部分則相對的少。我以為原因是內心世界的描述可以在作品中避免還要顧及真實生活中「外籍新娘」與臺灣家人的交談過程中可能會發生的理解上的落差這樣的一個普遍性事實，好集中力道去處理文化差異與身分認同的議題。

* 結語

這五部作品中來到臺灣的「外籍新娘」首先皆會遭遇到來自不同地方像是謀職時或是鄰里親友間形式頗為一致的歧視，認為她們無法勝任某些原本是臺灣人做的工作和內容不但含義相似（低劣）的形容。不過這些烏雲般如影隨形的貶抑詞彙會在她們被允許學習文字、開始識字後逐漸消散。擁有自給自足的經濟能力（販賣吃食）或是在團體中獲得成就（繪畫才能、提筆寫信）則是她們在這個「異鄉」被認同的開始。

對孩童來說這種題材的小說可能會是一個幫助他們思考應該怎麼樣面對所謂的「新臺灣之子」的機會，因為同儕裡的「異類」通常會備受矚目，要怎麼說才能讓團體（同學）理解接受他們的存在是一件在平常不過的事情所要顧及的事物其實是很複雜的。這一點可以從短短四年間就出版五部小說這件事情上得到證明，以各種寫作手法如鋪陳（處境）、譬喻（異同）和敘述（解釋）等苦心思索設計的內容都是為了使讀者可以更容易進入作品所建構出來的情境裡感同身受「新臺灣之子」們的難為。

延伸閱讀

1. 李光福文，達姆圖。《我也是臺灣人》（臺北縣新店市：小兵，2008）ISBN 9789866544071
2. 張友漁著，達姆圖。《西貢小子》（臺北市：天下雜誌，2009）ISBN 9789862410523
3. 李光福著。《哎呀！我的媽：外籍媽媽的奮鬥故事》（臺北市：新苗文化，2010）ISBN 9789574514533
4. 羅明道著。《別叫我外籍新娘的小孩》（臺北縣汐止市：培育文化，2010）ISBN 9789866439391
5. 蔡佐滄著。《我的越南媽媽》（臺北市：文房出版；新北市：商流總經銷，2011）ISBN 9789866342684